传播力与全球化:“国家再现”的叙述调控

■刘利刚

在全球化逆风时期,传播力有助于推进全球化。从符号叙述学的视角看,国家是“物—符号”或“符号—使用体”的“二联体”,是全球化的主体。“中国故事”是“国家再现”的重要内容。“中国故事”由叙述调控的“国家再现”讲述,能够产生相当大的叙事力量,对个体或团体产生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进程中凝聚不同主体解释项的“共同解释项”,“一带一路”是在“共同解释项”指导下推动全球化从“之间”走向“之中”的重要实践。要而言之,由叙述调控的“国家再现”生成的传播力有助于推进全球化。

[关键词]全球化;传播力;中国故事;国家再现;叙述调控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2)11-019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电影中红色文化的符号学研究”(21BXW093)、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建党百年来红色电影的传播符号学研究”(sisu202122)

刘利刚,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重庆 400031)

在全球化逆风时期,中国要继续坚定支持全球化,传播力是一支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P60)同时,二十大报告还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P46)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翔实,字里行间透露出“开放”二字。在全球化逆风时期,二十大报告不仅让全球看到了一个坚持开放反对封闭、坚持互利共赢反对“零和博弈”的中国,而且还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即加强国际“传播力”建设有助于推进全球化。

参与全球化的主体主要是“国家”,能否推进全球化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密切相关。而对一个国家的信任又与媒介对这个国家的再现(representation)紧密相关。符号叙述学是关于叙述的符号学,符号学所有原理对它都适用。[2](P4)从符号叙述学视角来看,国家是“物—符号”或“符号—使用体”的“二联体”,我们是通过媒介再现来理解我们的国家或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的人也通过媒介再现来理解他们的国家或其他国家,国家的媒介再现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世界(或国家)理解的一致性。

可以说,谁拥有了国家的媒介再现的叙述调控能力,谁就赢得了相当大的力量来控制个体或团体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正因如此,“国家的媒介再现”可谓之“国家再现”(national representation)。“中国故事”是“国家再现”的重要内容。“国家再现”产生的“传播力”有助于推进全球化。本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文主要就“国家再现”生成“传播力”的叙述调控机制,以及传播力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策略等进行探究。

一、“物—符号”或“符号—使用体”:作为全球化主体的“国家”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道时代命题,是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实践,而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能让世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继而更好地推进全球化。参与全球化的主体主要是国家,而有关国家及其起源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笔者主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起源学说为前提,从符号叙述学视角将国家看作是一个“物—符号”或“符号—使用体”的“二联体”。“物”是指具有物质性的“使用体”。“符号”是指“被认为携带着意义而接收的感知”[3](P27)。在人类社会中,物与符号实际上是很难分离的,每一种供使用的物或有使用目的的行为,都有可能带上符号意义,反过来每一种供使用的物也可以变为符号载体,这样就出现表意与使用性复合的“符号—使用体”(sign-function)[3](P27)。有学者认为,在罗兰·巴尔特1964年所写的《符号学原理》一书中,“sign-function”指兼有物的使用性的符号。[4](P285)依此意思,赵毅衡将巴尔特用法的“sign-function”翻译为了“符号—使用体”[3](P28)。因此,“物—符号”也可以看作是“符号—使用体”。

“国家”作为“物—符号”或“符号—使用体”,为笔者重新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起源学说提供了新视角。《古代社会史笔记》是晚年马克思阅读人类学著作时留下的摘录和评注,出于极度严格的责任心,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出版上述手稿。恩格斯在处理马克思遗留的文稿时,发现了他关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详细摘要。为了完成“亡友未完成的工作”[5](P15),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留下的摘要,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起源学说自提出以来,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取得了长足发展。列宁和苏联理论界、欧美考古界部分学者及中国学者均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与运用做出了贡献。本文姑且搁置这些后期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学说的研究,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学说本身,对国家意蕴做进一步的符号叙述学探究,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起源学说至今仍被公认为是一种最具权威性的国家学说。

我们一般把国家当作一个政治地理学名词看待, 并把国家行政管理当局看作国家的象征。当然,这种理解具有其合理性,而且它的合理性正受益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学说的滋养。不过,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学说本身,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从符号叙述学的视角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学说,至少可以认为,国家分为“物”或“使用体”和“符号”两部分。仔细分析这两部分,前者主要包括政治地理学意义上的领土、领海、领空及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监狱、警察等物质层面;后者主要包括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本身及作为意识形态其他形式的宗教、哲学、美学、文化等精神层面。

作为“物”或“使用体”的国家,是一种实体性存在,而作为“符号”的国家,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作为实体性存在反倒显而易见,而作为意识形态则难以被清晰地呈现。诚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6](P308)所谓“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和“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正是国家作为意识形态力量之所在。在大众文化的加持下,国家作为意识形态更具有迷惑性,这种迷惑性反过来也增加了作为“物”或“使用性”的国家的工具合理性。因此,可以说,作为“符号”的国家对作为“物”或“使用体”的国家起到修辞作用。而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学说,国家是社会身上的一个病瘤,当社会继续发展下去,为了保证整个机体的健康,国家必然要消失。[7](P510)马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学说是基于他们对过往历史和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得出的结论。

然而,就我们中国来说,尽管我们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还不够均等,还存在着贫富差距,存在着诸多矛盾, 但国家作为阶段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之本质, 自新中国诞生之日起就已然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的彻底性就在于:“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P37)目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因社会财富的有限和分布不均匀,所产生的暂时现象,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通过国家的调控会最终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最终要走向共产主义,我们的国家在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所服务的对象始终是人民,即使实现了共产主义,人民群众也需要国家,只不过国家服务人民群众的职能会发生变化。笔者之所以有以上判断,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为依据的。而至关重要的是,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我们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教条化使用,而是对其进行了中国化改造,使之适应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目前,中国继续坚定支持全球化,因为推进全球化能够为我们从社会主义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社会提供基础性的生产力和非地域性的普遍交流, 只有推进全球化才能化解全球化过程中遭遇的危机。就我们现处的社会阶段而言,无论是作为“物”或“使用体”的国家,还是作为“符号”的国家,皆肩负着推进全球化的历史使命,需要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社会职能。其中,就作为“符号”的国家而言,其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承载体”,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当代文化,里面都蕴藏着丰富的“故事资源”,其中一些故事资源本身已经以故事化的方式存在,而另一些则有待成为“故事”。

就传统文化中的“故事资源”而言,其可以在中国推进全球化过程中充分发挥展现中国的国家“符号”的作用。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民族英雄林则徐集古人语言而成的自勉联的上联,“海纳百川”源于《庄子·秋水》,以瀚海容纳百川的景象,指代广大涵容、广阔无碍的心胸;“有容乃大”源于《尚书·君陈》,强调厚德与包容的重要性。此类“故事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它们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皆可以进一步被叙述化为“故事”。此类例子,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中也非常丰富。这些中国文化的“故事资源”都可以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宝贵素材。

可见,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灵活地以叙述调控的“国家再现”来展现这些故事,充分利用它们生成的传播力推进全球化,进而彰显中国作为全球化的主体的作用和价值。

二、“三界通达”:“国家再现”的叙述调控

所谓“国家再现”,前文已经有所界定,特指国家的媒介再现。诚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如现象学所言从“呈现”(presentation)在“这里”或“那里”的国家来认识一个国家,尤其是外国,而往往是通过媒介的“再现”(representation)来认识一个国家。全球化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而且我们也深受其影响,但参与全球化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20世纪80年代从美国传出的一个概念,在交通、物流和互联网技术推动下,它不但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也改变着企业的经营理念、战略逻辑和商业模式。[8]“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虽然目前存在诸多定义,但通常其所指的是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卫生、生态等领域相互依存。

具体来说,如在体育界、娱乐界存在国际化的“明星”,而事实上各个领域都存在“明星”,这些“明星”看似都是一个个的个体,事实上他们也是一个个的“象征符号”。皮尔斯认为,一个符号由“再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现体”(representatum)、“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三部分构成。[9](P228)其中,“再现体”与“对象”之间并非“固定关系”,而可能迫于“解释项”之“无限衍义”的压力,常常形成“新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P501)确实,社会关系深刻地影响到一个人的身份建构。“明星”本身仅指“某个个体”,像普通人一样,而明星之所以是明星,皆因某种卓越才能被媒体“无限衍义”(解读、报道等)成了媒介事件甚或全球性媒介事件,进入了更大的社会传播网络,拥有了更多显著性的社会身份而已。因此,作为明星的个体,就不再仅是自己,而形成了“新的关系”,具有了“代表性”。

例如,电影明星李小龙,他是华人中最具影响力的功夫明星。他不仅将中国功夫带入了好莱坞,搬上了世界荧幕,而且还提升了“Kungfu”一词在西方世界的普及度,并阐释了中国功夫中的人生智慧与哲学理念。从符号叙述学的视角看,“李小龙”在一定时期就是中国功夫的“象征符号”,他不仅提升了华人在世界影视圈的地位与影响力,推动了中国功夫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而且还推动了世界对中国功夫的理解,对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诸多领域,不仅我们中国而且其他国家也都存在着享誉世界的“明星”。以“明星”为例主要是为了说明“代表性”问题。诚然全球化的主体是国家,而且通过叙述调控的“国家再现”产生的传播力能够更好地推进全球化,但是国家是一个“物—符号”或“符号—使用体”,即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存在者”。因此,在全球化的传播与交往中,往往出场的是国家的提喻即“代表者”。而这个“代表者”也可以理解为“某人参与某事件”。“代表者”以各种“再现体”指称其所代表的“对象”即“国家”。“代表者”除了是现实性的存在外,更多以“再现体”形式存在于由各类媒体所构筑的“符号文本”中。我们作为接收者正是通过阅读、观看、收听这些“符号文本”来认知“代表者”,进而了解其所代表的“国家”的。而之所以接受者愿意或喜欢阅读、观看、收听这些“符号文本”,皆因这些“符号文本”是由“叙述”构筑完成的。

那什么是叙述?理解叙述的定义,也就知道了人们为什么更加喜闻乐见于由叙述所构筑的“符号文本”。同时,也更能说明“叙述调控”对于“国家再现”生成“传播力”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叙述”的底线定义是:“1.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中。2.此文本可以被接受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2](P7)这个叙述的底线定义涉及了一个“叙述本文”成立的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是由特定主体所进行的两个叙述化过程,即“一次叙述化”和“二次叙述化”。

“一次叙述化”就是形成“叙述文本”,关键是把“人物”及其所做的“事”编码(encode)进符号文本中,而对这个编码是有要求的,这个要求体现在“二次叙述化”中,即接受者必须能够从符号文本中解读出“时间”和“意义”,否则“一次叙述化”是不成功的。也就是说,“叙述”底线定义中,“2”是“1”的条件,“2”保证了“1”所编码的“符号文本”是接受者乐于解码(decode)的“叙述文本”。因此,“符号文本”不一定是“叙述文本”,但“叙述文本”一定是“符号文本”,“符号文本”要成为“叙述文本”是有条件的。

既然文本是由符号构成的,而符号诚如艾柯所说其特点就是可以用来撒谎,“符号学是研究所有可以用来撒谎的东西的科学……撒谎理论的定义当作为一般符号学的一个相当完备的程序”[11](P58-59)。艾柯的理由是:“不能用来撒谎的东西,也不能用来表达真理,实际上就什么也不能表达。……每当存在着说谎可能时,就有一种符号功能。”“说谎可能性就是符号过程的特征。”[11](P70-74)正因符号不仅既可用来说谎又可用来表达真理,而且还是叙述不可或缺的基本材料,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叙述调控”让“叙述文本”进行“纪实型再现”或“虚构型再现”。在“国家再现”问题上,我们既要重视如新闻等“纪实型再现”,也要重视影视剧等“虚构型再现”。因为无论“纪实型再现”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还是“虚构型再现”,它们的“基础语义域”都扎根于“现实”,皆充满着因叙述而生成的传播力。

那么,如何通过“叙述调控”让“国家再现”展现为“纪实型再现”与“虚构型再现呢”?

首先,就“纪实型国家再现”而言,“叙述调控”所遵循的是“现实生活逻辑”。在通过叙述把代表国家的某个主体参与的事件编码入叙述文本时,一定要按照真实的“时间关系”“空间关系”及“因果关系”,不能对这三类关系进行“蒙太奇”式操作,尽可能对其进行“长镜头”记录。唯有如此,接收者在接受时,才能“还原”出真实的时空关系和因果关系,了解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和来龙去脉。例如,叙述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无论对其中的人和事进行新闻报道、拍摄纪录片、现场直播等,都应该按照“纪实型国家再现”方式进行“叙述调控”。

当然,就北京冬奥精神的国际传播而言,仅囿于新闻报道还远远不够,我们应充分抓住冬奥会这个契机,利用媒体融合做好“纪实型国家再现”。尽管图像符号不像文字符号那样能给予事物准确命名,但是图像符号能够“取悦于人”,诚如我们所见的绝大部分商标是“图像商标”,图像商标能够通过“一目了然”诱使购买者“一见倾心”。[12](P110)同样的逻辑,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作为图像符号,也具有图像商标的传播功能和效果。“冰墩墩”是憨态可掬的熊猫穿上了冰壳衣服,但冰壳之下传递出的却是“暖”和“软”,这使原本紧张的体育竞技变得和谐友爱。在疫情之下,“冰墩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冰墩墩”身上,中国文化的要素随处可见,其背后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挖掘,因为它们就是连通世界的“中国故事”,由其所产生的传播力既有助于北京冬奥精神的全球传播,又有助于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

其次,就“虚构型国家再现”而言,在叙述文本的话语编码层面可以有“超现实”的“人物”和“事件”,但叙述文本中的故事所扎根的“基础语义域”一定要在现实中。例如,电影《长津湖》就是基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历史事实改编的, 我们作为接受者理解这部电影的“基础语义域”就是“抗美援朝的真实历史”,这也正是这部电影具有极强的传播力之关键。当然,还存在许多诸如此类基于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传播红色文化的影视剧,它们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在革命与建设年代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艰辛奋斗。同时,也存在许多像《红海行动》等非具体历史事件改编但反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影片。尽管这些影片都属于“虚构型国家再现”,但是它们的基础语义域都通达于实在世界。关于通达问题,后文还要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诚然,选择“中国故事”的内容非常重要,但就“虚构型国家再现”而言,其在叙述技巧上要比“纪实型国家再现”更加灵活多样。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上,我们往往更倾向于从修辞的角度入手,这固然是好,但鉴于中国故事不只是讲给中国人听的,还要讲给全世界听,所以我们不妨换个视角即从受众认知的角度来举例分析一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电影《功夫熊猫》系列是极佳的例子,虽然其并非中国所拍,而且所传播的价值观也是美国的,但影片却引发了中国观众的认同,而且也正由于因其被认同所带来的高票房,《功夫熊猫》连续出了三部。

不难发现,《功夫熊猫》之所以能够引发国内观众的认同,主要原因在于熊猫和功夫皆为“中国元素”。这就启发我们,不论对内还是对外讲中国故事都需要重视受众的接受维度,要通过叙述调控把与各个国家受众自身密切相关的“文化要素”融入“国家再现”的符号能指层面,同时也要将中国理念、中国思想、中国主张等寓于“国家再现”的符号所指层面,构建融通中外的“国家再现”,尽可能让全世界的受众乐于接受并易于理解。

根据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提出的“三界通达”理论,除了我们所处的“实在世界”外,在叙述文本中还存在“可能世界”和“不可能世界”。[2](P176-197)倘若对这三个世界进行排序,按照“虚构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实在世界、可能世界、不可能世界;按照“通达程度由弱到强”,依次为不可能世界、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可能世界、实在世界。前文所提的“基础语义域”就来自“实在世界”。“实在世界”的“通达程度”最强,而“虚构程度”最低。“实在世界”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可能世界、不可能世界的虚构性叙述,就因为它们皆扎根于或通达于实在世界的“基础语义域”,而“基础语义域”正是我们理解叙述文本的基础。

“国家再现”既可以在纪实型叙述文本中展现,也可以在虚构型叙述文本中展现。由于可能世界、不可能世界都可以通达“实在世界”的“基础语义域”,所以当我们正在接受这些叙述文本时,所感知到的几乎都是“真人真事”,因为叙述的秘密就在于通过“叙述调控”把“人物”和“事件”进行蒙太奇式的排列与组合,形成新的时空关系和因果关系。按照前文符号意指三分式,“解释项”之“无限衍义”常常压迫“再现体”与“对象”之间形成“新的关系”。“叙述调控”作为“解释项”就是在进行“无限衍义”,发送者出于对能否实现“意图定点”的考虑,常常需要调整“无限衍义”展开的程度,较大程度的“无限衍义”往往形成的叙述文本虚构程度高、通达程度低,反过来,较小程度的“无限衍义”,往往形成的叙述文本的虚构程度较低、通达程度较高。

因此,“三界通达”即实在世界、可能世界及不可能世界之“通达程度”的高低可通过“叙述”这个阀门来调节。无论在“国家再现”的叙述中我们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怎样的蒙太奇式或长镜头式排列与组合,都要保证所形成的“叙述文本”的“基础语义域”始终在实在世界,它是“国家再现”生成传播力的坚实底座。

三、“共同解释项”:推进“全球化”的交流条件

诚如前文所言,“全球化”有着诸多定义,但通常它所指的是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卫生、生态等领域相互依存。然而,这种国家与国家之间在诸多方面的“相互依存”是建立在有“共同话语”的基础之上的。从符号叙述学的视角看,这种“共同话语”即所谓的“共同解释项”。皮尔斯提出的普遍修辞学认为,交流发生存在三个条件:“(1)必然存在一个发送者和一个解释者;(2)必然存在某物在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交流;(3)在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交流的某物必须是一种东西,即它能够在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建立起某些共同解释项(common interpretant)。”[13](P249)在上述交流发生的三个条件中,“东西”是指“被交流符号”,“被交流符号”能够在发送者和解释者中分别建立起一种解释项,即“意向解释项”(intentional interpretant)和“效力解释项”(effectual interpretant)。关键是,当“被交流符号”能够把这两种解释项“熔合”(fusing)为一种“共同解释项”(common interpretant)时,交流行为就会发生。[13](P249-253)

从上述交流发生的条件来看,“共同解释项”是全球化的基础,由叙述调控的“国家再现”生成的传播力有助于“共同解释项”的形成。倘若没有形成“共同解释项”,那么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卫生、生态等领域的全球化就会受阻甚至停顿。“共同解释项”是由“被交流符号”将“意向解释项”和“效力解释项”熔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意向解释项”产生于发送者一端,而“效力解释项”产生于解释者一端,“被交流符号”起到熔合这两个解释项的作用。

传播力推进全球化,必然建基于传播力助力形成“共同解释项”的基础之上。而要生成传播力,就得有能够使交流发生的“被交流符号”。而这个“被交流符号”只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变量”,并不是一个“常量”。而至于这个变量具体是什么,则与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对象”密切相关。前文探讨了国家再现的叙述调控问题,国家再现通过叙述调控可以分别进行纪实型再现和虚构型再现。而事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实上,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国家再现,它都仅是一种“被交流符号”。交流能否发生,还要看“被交流符号”能否“熔合”发送者的“意向解释项”和解释者的“效力解释项”。因此,作为“被交流符号”的“国家再现”生成的“传播力”尤为重要,因为它具有“熔合”之力。

中国在推进全球化上做出了巨大贡献。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的提出,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与沿线国家建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截至目前,虽然遭受新冠疫情等影响,但“一带一路”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即“被交流符号”,被以“纪实型国家再现”(如新闻、纪录片等)和“虚构型国家再现”(如影视剧、戏剧等)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而这些呈现所生成的传播力“熔合”了“一带一路”参与各方,促生了“共同解释项”,而反过来,这些“共同解释项”又对“一带一路”的深化起到了指导作用。

当然,“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被交流符号”(丝绸之路历史符号等)在将中国人民的“意向解释项”(“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效力解释项”(他们自己的理念)熔合为“共同解释项”的过程中,起初“一带一路”理念只能是中国人民的“意向解释项”,中间经过不间断地“重复与创新”式“国家再现”,最后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心中产生了“效力解释项”。需要强调的是,“意向解释项”“效力解释项”“被交流符号”并非是一种“静态概念”,而实质上是传播动力学意义上的概念,始终处于调整与变化中。作为“被交流符号”的“国家再现”,要不断地通过叙述调控重新编码与解码,而之所以要如此操作,是为了匹配“意向解释项”和“效力解释项”的变动。“国家再现”在整个传播动力学系统中起着连接与匹配各个要素的作用。

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全球化,我们的文化符号就得通过“国家再现”走出去,使其他国家产生“效力解释项”,继而影响世界。但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再现”的“叙述视角”一定要妥当,如此这样生成的传播力大小、方向才精准。第二,我们需要站在一个全球语境上进行“国家再现”。倘若只站在我们中国自己的立场上进行“国家再现”,那么其他国家的人民就不一定能够理解,当然也就不会与我们达成“共同解释项”。第三,叙述调控的“国家再现”一定要带有温度、互相感染、有感情,即以接受者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跟他们讲话、讲道理,而不能急于求成、过于强势。

由于推动全球化的传播力只有是可被调控的且是可持续的才能促生“共同解释项”,所以“国家再现”也理当是可被调控的且持续性的。“国家再现”既可以是“一次再现”,也可以是“二次再现”“三次再现”……“N次再现”。通过不断地重新叙述就能够矫正被倒置、被歪曲的“国家再现”,进而生成适合的传播力。这一过程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马克思在批评“唯心主义的影子”和“经验主义的直觉观”时,就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他把“影子”和“直觉观”都看作是历史产物,它们都是“历史的生活过程”。W.J.T.米歇尔在书中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4](P223)米歇尔解释说,倘若要纠正“唯心主义的影子”,需要将这些影子与实际的物质条件、实际的生活重新连接。而倘若要纠正“经验主义的直觉观”,则需要将直觉到的视觉形象放在时间之中,视其为某一“历史生活过程”的产物,而非呈现(presentation)给感官的简单数据。[14](P223)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也能够为我们矫正被倒置、被歪曲的“国家再现”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四、全球化的深化:从“之间”走向“之中”

“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构思,已从一国延伸到‘一带一路’的沿边多国,从而把习近平共同体思想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了起来。”[15]对于全球化,中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均做出了巨大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化贡献了理论,“一带一路”为全球化进行了实践。在全球化中,中国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与其背后的指导理论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分割。“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前文已述的“共同解释项”紧密相关,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结合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而创新性地提出的重大命题。

“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关切人的存在和社会发展的主旨思想,是对欧洲古代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等哲学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超越。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传统哲学思想在认识事物时,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和“原因论”。亚里士多德是根据以上两种思路来确认一个“事物”之所以是这个“事物”的。直到今天这个哲学传统的内核还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主—客二元论”,因为从这个哲学传统中我们看到了“主体性哲学”的崛起。只不过,这一哲学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从笛卡尔开始,判断我们之外的事物之所以是这个事物的根据,从“神”或“上帝”换成了“人”。笔者将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称为“之间式认识”。

但是,在现代西方思想家海德格尔看来,上述“主—客二分”实际上并非认识的真正起点,而是认识的终点,或者说其是认识过程中的某个“中值点”。只有当认识结束了,我们才能分清楚什么是主体,什么是客体。在认识活动的开端,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客体的概念和主体的概念,我们只是跟它们在一起。例如,前文从符号叙述学视角所讨论的“国家”这个“物—符号”二元体,当我们谈到它之前,我们是没有一个清晰的关于国家的概念的。国家是我们认识的结果。笔者将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称为“之中式认识”。

需要强调的是,不是说传统的“之间式认识”错了,而是说在它之前还有一个更加基础性的“之中式认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当我们将全球化的主体都当作一个“他者”看待时,由于缺乏“之中式认识”(基础存在论)这个基础,所以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声音。从此意义上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弥补了之前有关全球化论断的哲学基础之不足,为全球化在“之中式认识”(基础存在论)意义上找到了出路。

事实上,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此在”的中国是这样一个存在者:“它在其存在中有所领会地对这一存在有所作为。”[16](P75)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作为全球化参与者中的一员,正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其不分主客的“域境”来参与全球化实践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之所以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也正因为它是以“在世界之中存在”[16](P89)为哲学前提的,同时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较于传统哲学来说更具有超越性,它对全球化深入推进更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传统哲学思想的超越,笔者称之为:从“之间”走向了“之中”。

而且,就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来看,中国的确是从“之间”走向了“之中”。尤其是当前新冠疫情、气候异常及能源危机等全球性症候的出现更能说明,人类只有通过全球化携起手来,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才能应对面临的危机。我们必须通过叙述调控的“国家再现”生成的传播力,让全世界更多的国家、团体、个人明白:中国坚定支持全球化,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绝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而是“在世界之中”有所领会地对世界有所贡献。中国人历来信奉和平。《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17](P2458)现在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希望全球都和平发展,好好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过日子。《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8](P1634)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主客未分为出发点,其他国家有好事,我们同喜;其他国家有难,我们同情。因而其他国家人民的情绪与我们的情绪共在、共通。

总之,全球化的深化是参与各方从“之间”走向“之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除了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具有基础存在论意义的指导理念,有“一带一路”这样建设性的实践活动外,还需要叙述调控的“国家再现”产生的传播力去推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3]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德)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范黎波.“全球化”的中国含义[J].新财经,2014,(3).

[9]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vol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Umberto Eco.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12]赵宪章.文学图像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13](美)C.S.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M].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14](美)W.J.T.米歇尔.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5]谢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及建构实践[J].哲学研究,2019,(2).

[16](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7]十三经注疏: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彭民权】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